

19世纪俄国的汉学研究

文/畔叶千明 译/尹禄

19世纪,沙俄传道团的成员在北京学会了汉语,他们对中国进行探索,关注宫殿、城市和人们的状态,并向本国报告,或者在沙俄的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他们在西方汉学家群体的影响下写作,但同时认为自己的活动和西方汉学家相比更加富有成效。

引言

世界各国在自己文化的启蒙时代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经典文本的影响,俄罗斯也不例外。19世纪上半叶,受到西欧社会思想影响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接受了西欧关于“天朝中国”的阐释,同时也开始关注本国东方学者用俄语完成的关于中国的著述。

在现代语文学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俄国社会是逐渐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想象与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的,特别是在历史哲学领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对于19世纪俄国的影响,这方面问题

至今仍未获得充分的研究。19世纪上半叶,俄国传道团曾积极研究过中国文化,本文正是着眼于这一点,进一步阐释俄国传教士对于中国经典文本的研究。

北京的俄国传道团以博学广识著称,而传教士也不单单从事宗教活动。按照中国朝廷的看法,沙俄传道团与其说是宗教组织,不如说是清朝和邻国文化交流体系的一部分。与其他俄国和西方传教组织的一个不同是,传道团成员住在北京的一座教会会馆,即“会同馆”,后更名为“俄罗斯南馆”。

19世纪传道团的成员在北京学会了汉语,他们对中国进行探索,关注宫殿、城市和人们的状态,并向本国报告,或者在俄国的刊物上发表相关的研究

文章。他们在西方汉学家群体的影响下写作,但同时认为自己的活动和西方汉学家相比更加富有成效。这些人的文章证实了他们的远见,但文章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某些局限性。

如何学习汉语

俄罗斯的中国研究始于俄国传道团,所以他们对经典文本的研究也必定发端于那个时期。德明是第十一届传道团的一名学生,1830至1836年旅居北京。德明的文章《中国行》(1843)里就提到了他们着手研究中国的原因:

(下转12版) →



雅金甫(比丘林)的《汉文启蒙》(1835)是第一部俄语的汉语语法书

← (上接10版)

游客的头部上方,意欲凸显大教堂对世人造成的震撼。其中也一定包括托尔斯泰。

第三个可以“索隐”的史实也发生在1856年。这一年年初,列夫·托尔斯泰到圣彼得堡,在1856年2月4日的日记中记下这样一句:“在托尔斯泰家晚会,从涅克拉索夫那里拿到钱,和库特列尔呆坐到两点。”(《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第65页)这一笔日记,有三个“行迹”值得“索隐”,一个是从涅克拉索夫拿到的钱是400卢布预支稿费。《现代人》杂志培育了托尔斯泰,但是,托尔斯泰没有把自己的大型作品交给《现代人》。另外,这位“库特列尔”是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时的战友,他作为托尔斯泰的文学“模特”出现在《哈吉·穆拉特》当中。高加索服役,塞瓦斯托波尔参战,这是托尔斯泰战争观建立的基础,不仅仅只是影响了《哈吉·穆拉特》,更强烈影响了《战争与和平》。但是,对于我的论题,这段日记所记的第三个“行迹”最值得关注:这里提到的晚会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堂叔费得罗·彼德洛维奇·托尔斯泰家的晚会。

费·彼·托尔斯泰在1828年至1859年间是俄罗斯艺术

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家的晚会,聚集了当时许多著名作家、音乐家、演员。费·彼·托尔斯泰本人也是一个造型艺术家。他传世的作品极少,但是当年,他的名气极大,他曾在圣彼得堡造币厂担任设计师,1812年卫国战争之后,他设计了一套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的纪念章,纪念章共21枚,选择了1812—1814年战争最有代表性的场面加以塑造。2012年,我见到了这批纪念章原件,它们被镶嵌在16厘米的磁盘里,图案庄重典雅,基本上是古罗马风格。费·彼·托尔斯泰从此名声大振。关于他,更为著名的是这些纪念1812年战事的纪念章图案被应用到圣彼得堡冬宫广场的亚历山大柱的基座浮雕设计当中。亚历山大柱是圣彼得堡纪念1812年战争胜利的最宏大的纪念碑。1834年8月30日,冬宫广场举行浩大的亚历山大柱揭幕仪式,场面空前壮观。

还有更为重要的信息。正是在列夫·托尔斯泰孕育十二月党人故事的1850年代,他的这位叔公担任了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大门的模型设计。大教堂有12扇大门,每一个立面各三扇,用紫铜铸造而成。也就是在青年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出入叔公沙龙的年代,这些大教堂的大门从图纸落到了

地面。

最后一个可“索隐”的事件是:1860年,基督救主大教堂外部脚手架全部拆除,这座丰碑首次亮相,它的宏伟姿态全部展现给世人。这显然与迎接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热潮有关。1862年,在大教堂的屋顶安装了青铜护栏,这是原设计没有的新增项目。其目的是供人登顶参观。

众所周知,这一段时间,列夫·托尔斯泰全身心投入两件事,一是雅斯纳亚·伯良纳的教育以及一切与教育相关的事。另一个是自己的婚姻。两件事表面上都与大教堂无关。但是,办教育需要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取经”,而每一次“取经”都要经过莫斯科,而每一次到莫斯科,托尔斯泰都必到未来的未婚妻家里。

托尔斯泰未婚妻索菲亚娘家姓别尔斯。索菲亚的父亲是宫廷医生,他的家就在克林姆林宫之内,1860年至1862年,托尔斯泰出入未婚妻别尔斯家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刚刚拆除了脚手架的辉煌的大教堂。这座大教堂作为一个物质实体,总在托尔斯泰的视野当中。而我们知道,一年之后,托尔斯泰离开十二月党人的主题,动笔创作《战争与和平》。

我在莫斯科买到一本画

册,它是1888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摄影图片集,书名为《从基督救主大教堂看莫斯科》,其中是一位摄影家在1867年从大教堂俯拍莫斯科的360度全景组图。从摄影家的视点可见,1867年前后,大教堂的顶部是莫斯科城最新的制高点。大教堂作为莫斯科的新的核心,作为莫斯科东正教宗教以及俄罗斯政治核心,作为俄罗斯帝国国家级纪念1812年战争的核心,已经赫然耸立起来了。

如果用“反打镜头”阅读这些摄影作品,那么,行走在莫斯科街巷的人,一定是抬头即见大教堂。而这几年,正是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高峰期。

以上四条“索隐”,可以证明列夫·托尔斯泰与莫斯科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关联,绝不仅仅是“擦肩而过”,这些线索的交汇,不断刺激、激发着托尔斯泰创作伟大作品的激情。

《战争与和平》与大教堂的对话

大教堂是皇家确立的官方纪念碑,而《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对俄国“官方1812年书写”的抵抗。官方的盛大从反方向“刺激”着托尔斯泰,刺激他一定要写出一部“对视”大教堂

的文学大殿。

这里仅举一例。《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发明了一个著名的“圆锥体”理论。托尔斯泰认为,参战的所有人对战争的意义,就像一个圆锥体,沙皇以及沙皇之下的大臣们对战争的作用,高高在上,就像在圆锥体的顶端,而普通士兵、普通人民大众对战争的意义,就像在圆锥体的底部:“军事组织酷似圆锥体,直径最大的底部是由列兵组成的;比底部较高的截面,是由较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以此类推,直到圆锥体的顶端就是总司令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八卷,363页)圆锥体顶端,高高在上,指挥运筹,但是,对战争的实际作用却十分遥远,十分渺小。拿破仑如此,亚历山大一世也是如此。而普通士兵、人民大众则是战争合力中的大多数,他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圆锥体”的战争学说,是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小说的“尾声”,托尔斯泰不惜破坏小说的艺术规则,用相当大的理论性文字论证这个“圆锥体”之说。

这恰好是从“下”向“上”对视大教堂的结果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